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南北朝诗选

程章灿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始于1897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袁行霈题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南北朝诗选

程章灿◆撰



商务印书馆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北朝诗选/程章灿撰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2017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ISBN 978 - 7 - 100 - 14065 - 2

I. ①南… II. ①程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诗集—
中国—南北朝时代 IV. ①I222.7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32678 号

权利保留,侵权必究。

南北朝诗选

(古代诗词典藏本)

程章灿 撰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4065 - 2

2017年8月第1版

开本 880×1240 1/32

2017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张 10

定价:32.00 元

古代诗词典藏本

主 编 袁行霈

副主编 刘跃进

编 委 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曹 旭 陈祖美 程章灿 过常宝 蒋 寅

刘 石 刘扬忠 莫砺锋 钱志熙 王兆鹏

钟振振 周洪波 左东岭

策 划 厚艳芬

走出学术象牙塔

刘跃进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。相比较而言，我们在普及工作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。尽管各类选注本层出不穷，但精品甚少。很多学者不屑于做普及工作，认为体现不出研究水平；即便有水平的人去做，也很难得到同行认可。这样一种偏见，必须改变。

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，真正在学术史上确立地位的学者，都与其尽心致力于学术普及工作密切相关。汉代对于经典的注释、唐代对于古注的疏证以及清代乾嘉诸老对于历代经典的重新阐释，其出发点多是普及经典知识。现代学术研究又何尝不该如此？即以我供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例，六十多年前刚刚筹划建立文学所的时候，最初的工作主要就是选注历代文学经典作品。近来翻阅《王伯祥日记》，里面详细记载了郑振铎、何其芳等人如何精心策划《诗经选》《史记选》《汉魏六朝诗选》《三曹诗选》《唐诗选》《宋诗选注》的工作，印象深刻。每一部书的编纂，从篇目的确定，到注释的推敲，都经过反复打磨。然后内部油印，送到国内相关研究单位、高等院校，广泛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。经过这样几个回合，才最后定稿，公开出版。这样的书，阐释经典，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经典，多数印行在数

十万册以上，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而这些作者的名字和声誉，也逐渐走出学术圈，为广大读者所熟知。前辈学者的工作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。

启示之一，我们必须对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有一种正确的认识。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，说易行难。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明确指出：“人民要求普及，跟着也就要求提高，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。在这里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，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。而这种提高，不是从空中提高，不是关门提高，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。这种提高，为普及所决定，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。”学术研究真正服务于人民大众，首先就是要做好普及工作。没有普及，何来提高？但提高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更好地普及。现在，不少学者宁愿躲进象牙塔中做专精研究，也不愿意做点文化普及工作。这种观念值得商榷。毫无疑问，专精研究当然应当鼓励，给予尊重，这个社会也确实需要一批很专精的研究者，去做专业性很强的研究，尽管这种研究可能对社会现实没有直接作用，但是对我们整个文化发展来说又是必不可少的。这道理不言自明。但同时，我们更需要一批人出来宣讲传统文化，让专家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为广大所认知。学术工作者来自人民群众，学术研究的本质也要求必须关注社会、依靠群众。如果我们的学术脱离人民群众，那就成了无根之木，难免凋零枯索的命运。这道理不言而喻。

启示之二，做好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首先要求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积累。康德《逻辑学讲义·导论》说过：“学术的讲述是通俗讲述的基础。因为只有能够彻底讲述某物的

人，才能以通俗的方式讲述它。”这段话把提高与普及的关系讲得非常明白。提高在前，普及在后。普及不是随意发挥，一定是在提高基础上的普及才有价值。真正的普及工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普及工作者，必须是在他这个领域掌握了丰富知识的研究者。没有深入的研究，哪来生动的普及？王伯祥、余冠英、钱锺书等人的学术普及工作就是成功的典范。对学者而言，深入易，浅出难。浅出所以难，是对作者要求高，他必须真正读懂经典作品，才不至于把经念歪。我们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，专注于某一学术领域，遇到不懂的地方，偷懒的办法就是绕过去，而要讲给大众听，就无法藏拙。因此，做好普及工作，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积学储宝、研阅穷照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普及工作才会更有实效，也才会更有意义。

启示之三，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，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，更是传递一种理念，一种理想，甚至还可以说，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。大家都认同这样的观点，即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和灵魂。一个不知本来的民族，是绝对没有未来的希望的。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显得尤为重要。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，物质文化可以全球化，而精神文化却有其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文学研究工作者，有必要深入总结我们民族的传统特性和现实追求，并把这种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为人民大众的行为准则和共同梦想。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，将会永久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由上述几点启示来看，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这套“古

代诗词典藏本”，恰逢其时，其意义自不必多说。编者的态度是认真的，他们以“阐释经典本身也要成为经典”为追求，其选家皆术有专攻，在其所选评方面具有相当的专精研究与学术影响，从而保证了选本的专业性与权威性。

正是由于每位选注者的研究领域、研究特点不同，因此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强求整套丛书风格整齐划一，而允许一选本有一选本之个性特色。这里仅举数例：李山教授的《诗经选》，仿佛带领读者做了一次重回“诗经世界”的新旅——重新审读其字句、篇章，重新考订其创作年代，勾勒其礼乐背景，体味其文化意蕴，欣赏其风雅艺术，考察其歌唱方式……《王维诗选》的作者王志清教授认为，王维诗乃诗之哲学，亦可谓哲学之诗。故其选评，敏于感悟，精于赏玩；其评赏文字，巧于切入，工于辞采。《李清照诗词选》的作者陈祖美先生，在历代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，更贴近窥见了李清照的种种内心隐秘，从而细绎出易安的十余种“心事”——幼年失恃、党争株连、婕妤之叹，以及终生无嗣的庄姜之悲等等，提出了许多新人耳目的独到见解。

无须赘言，只这几本书的简略介绍，即已充分显示出选注者的学术个性。在大的统一的原则下，保留各个选本自己独特的面孔，这一点，近于文学所编写经典读本的传统。钱锺书先生的《宋诗选注》，就特别强调自己“注”的特色，而与其他选本略有不同。希望这种不拘一格、力避匠气的文风与学风，贯彻丛书始终，从而涌现出更多的既拥有学术品位又文采斐然，既不乏前沿理论、自出己见又深入浅出的精

品选本。

丛书付梓在即，编者希望我就上述特色发表感想，以便让更多的读者理解，这种信任让我感动。确实，好书好序，相得益彰。如果翻开一部新书，上来就是一篇乏味的序言，就好像刚出门，便遇上障碍物，诚可谓“出门即有碍，谁谓天地宽”，叫人眉蹙。顾炎武《日知录》早就告诫：“凡书有所发明，序可也；无所发明，但纪成书之岁可也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序。”贸然作序，对读者可能会是一种冒犯。但我想，好书确实需要介绍，好意也要有所表达。我真诚地呼吁我们的同行，在努力攀登学术高峰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为社会尽些心力，为国家文化建设奉献我们的绵薄之力。

六十年前，文学研究所推出的经典读本，以著者自己研究为基础，广泛借鉴吸收前人成果，取得空前成就，影响至今。我们相信，商务印书馆推出的这套“古代诗词典藏本”，也一定能在学术普及工作方面推陈出新，为广大读者所认可。

2014年5月30日

草于京城爱吾庐

导 言

一

为南北朝诗歌编一部选本，虽然不缺少理由，但这些理由也不是不证自明，需要先说在前面。这样的不自信，是历史强加于我们的负担之一。

在人们熟悉的文学史和诗歌史框架中，南北朝诗歌从来不是最引人注目的那个单元。相反，它作为一个整体，被“黑”的机会要比被点赞的机会多得多，被有意遗忘的时候要比被历史记住的时候多得多。什么仇，什么怨，竟然让它身后聚集起那么多“敌对势力”？一言难尽。对南北朝文学抱有合理或不合理的偏见，投以正当或不正当的鄙视的，不乏名声赫赫的诗文大家名家。比如唐代诗仙李白。他在诗篇《古风》里就曾经高声宣扬：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。”建安以来的文学都入不了他的法眼，诗歌当然也在其中，南北朝诗歌是自郅以下，更可以一笔抹煞。考虑到李白的时代坐标，这两句诗几乎就是专门“黑”南北朝文学的。又比如另一个唐代大文豪、被宋代大文豪苏轼捧成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。轮到他来“黑”南北朝文学的时候，更是不加掩饰，肆无忌惮。在《荐士》诗中，韩愈指名道姓嘲笑南朝文学，把它们说成几乎一文不

值：“齐梁及陈隋，众作等蝉噪。”再比如苏轼，他对南北朝文学也常常口诛笔伐，锋芒所向，从作家诗人到批评家无一幸免。他在致友人的书信中，轻蔑地批评《文选》所收录的西汉苏武、李陵的赠答诗歌，至于李陵与苏武的书信，他认为“词句儇浅，正齐、梁间小儿所拟作，决非西汉文”，可惜编纂《文选》的梁昭明太子萧统“拙于文而陋于识”（《答刘沔都曹书》），缺少眼光，才被齐梁小儿蒙混过去。

李白、韩愈、苏轼自然是文坛大人物，但大人物也免不了说大话，而且还难免造成“英雄欺人”的结果，不管这结果是他们有心的，还有无意的。所以，听大人物们说话，切不可盲目轻信，照单全收，否则就上了英雄的当。表字玄晖、因为出任宣城太守而得到“谢宣城”这个雅号的诗人谢朓，毫无疑问是生活在南齐时代的，比建安时代晚了差不多二百五十年。可是，李白一边说“自从建安来，绮丽不足珍”，一边又说“解道澄江静如练，令人长忆谢玄晖”（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》），分明是此一时彼一时，到哪山唱哪山的歌。清代诗家也兼诗评家的王士禛，早就看出了青莲居士的自相矛盾。他的《论诗绝句》中说：“青莲才笔九州横，六代淫哇总废声。白纻青山魂魄在，一生低首谢宣城。”我们无法否认，受到李白钦敬的谢朓正是他所鄙夷的六代诗人之一，正如我们同样不能否认，声称“六代淫哇总废声”与“一生低首谢宣城”的是同一个人。

从整体上“黑”南北朝文学，还有一个常见的策略，那就是把南北朝文学简单化为齐梁文学、梁陈文学、陈隋

文学，或者置换为六朝文学、六代文学，然后从政治上将其贬低，从道德上加以申斥。南北朝地缘政治上的南北分裂与对峙，南北政权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，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乱和时局动荡，六朝通脱任诞的社会风气和自由不羁的思想状况，在喜欢大一统盛世的中国人看来，六朝就是一个不堪回首的乱世，一个夹于汉、唐两个盛世之间的衰世，一个两座高峰之间的低谷。唐代史官对六朝的批判更是不遗余力，对塑造南朝的负面形象居功至伟，于是，六朝文学，包括这个时代的诗歌，因为先天背上了“乱世”和“衰世”的政治黑锅，而沦为文学史上的弱势群体，成为被轻视、甚至被忽视的群体存在。南朝作为六朝大家庭的一分子，而且基本上是家中最不“成器”的一员，更逃脱不了这个命运了。如此下来，后代很多作家，即使私淑或者暗地里服膺南朝文学，但是从政治正确出发，也总要想方设法，与南朝撇清关系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
实际上，南北朝的历史是复杂而鲜活的，遗憾的是，我们往往习惯于把南北朝全然视为南北对峙分裂，把南北朝诗歌视为盛世的过渡，衰世的低谷，失于平面化，流于简单化。当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，而东魏与西魏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代，六世纪的中国，曾经又一次出现过“三国时代”。漂泊北朝的南朝诗人颜之推，曾经写过一首诗，题为《从周入齐夜度砥柱》，就形象地勾画出这个活生生的三国鼎立的形势局面。唐朝人丘悦作过一部《三国典略》，其核心主题就是这一段历史，可惜很少人还记得。本书选入这篇诗作，也有提示这段历史的意思。人是容易

健忘的一种动物，得鱼忘筌，过河拆桥，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就被轻易地省略掉了。

历史如此，诗歌也是这样。当文学史把南朝诗歌与汉魏或者魏晋诗歌相联接，或者相并列，作为魏晋南北朝或者汉魏六朝文学的组成部分，就有一个权威的声音警示我们：汉魏、魏晋乃至晋宋的诗歌，多少还有可能与风骨、骨力扯上关系，到了齐梁、梁陈、陈隋，就每况愈下，越发丽靡，甚至不可救药了。所以，是作为“后生”的南北朝多少分享了魏晋或汉魏的荣光，而作为前辈的魏晋和汉魏则多少受到了南北朝的牵累。几百年以后，盛唐诗人杜甫在《戏为六绝句》中说过：“不觉前贤畏后生”，几乎可以移用来比拟这种局面。所以，尽管很多后代诗人作家从南北朝诗歌中获得哺养，却羞于承认，或者勇于否认，说轻一些，这叫言行不一、自相矛盾，如果说重一些，那就是忘恩负义。

南北朝诗歌是南北朝文学的主体。它要挺直腰杆，获得自己的地位，也不难，只要唤醒文学史中的历史记忆，洗去曾经的骂名和污名，摆出曾经树立的典范，摊开曾经积累的资本，就能名正言顺了。

二

谁都知道，诗史与政治史是两码事。诗史与诗风的盛衰节奏，并不一定与政治史合拍。政治史可以截然划清界限，而诗歌史的分期往往是模糊重叠的。一个诗人可以跨越两个朝代，一种诗风也可以绵延于两个时段。可是，轮

到要为某一段诗史划清起讫点，大多数时候还是照搬或者参照政治史上的朝代起讫、王位更代。有一些诗坛的新动向，正好发生于前后两个朝代之间，所以，诗歌史上有所谓“晋宋之际”的说法，这无疑是一个左右逢源的时期，也是一种前后两个朝代都不得罪的分法。谁都知道，人为地为诗史划定一个明确的起讫点，无非是慰情聊胜于无的做法。对这部诗选来说，与其把晋宋之间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，不如模糊一些为好；模糊就有可能灵活，有空间机动。以晋宋之际的谢瞻作为《南北朝诗选》中的第一人，就是这种灵活、机动的产物。谢瞻本人由晋入宋，虽然入宋只活了两年，在刘裕即位的第二年，他就去世了；他的《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》更是作于刘裕上台之前，当时的国号还是晋，但晋早已名存实亡，真正执掌天下权柄的是宋公刘裕。天下早已是宋的天下，只是国号暂时没换而已。把这个人的这首诗列在《南北朝诗选》第一篇，正可以突出诗歌史和政治史的不同步。

接下来选录的是颜延之和谢灵运。这两个也是由晋入宋，但在刘宋生活了较长一段时间。他们代表的是南北朝诗人中最重要的一群——世族诗人。从《世说新语》以及六朝史传中，经常可以看到世族子弟早慧、文才卓异的例子。谢玄自许芝兰玉树生于阶庭，那是陈郡谢氏家门内的自尊和自豪；颜延之《赠王太常》称许琅琊王氏“舒文广国华”，那是旁观者的揄扬和恭维。这些都有事实的依据，并没有太多的夸张。在门阀政治最为典型的东晋时代，以王导和谢安为核心的王谢两家在政坛上占据了主导地位，

当时甚至有“王（琅琊王氏）与马（王室司马氏），共天下”的说法。在文坛特别是诗坛上，世族尤其是王谢这两个一等高门的表现，格外令人瞩目。东晋南朝诗坛上的新风气和新时尚，几乎都是由世家大族引领的，从东晋的玄言诗到南朝的山水诗、永明声律说，从谢惠连体、联句到赋得体，少有例外。也许是因为玄言诗后来的诗史评价不高，所以，东晋诗史给后人留下的印象是：非世族高门出身的陶渊明，风头压过了一群王谢子弟。但另一方面，晋宋之际，“理过其辞，淡乎寡味”（《诗品序》）的玄言诗，被新兴的山水诗风气取代，而开创新风的人物，正是出自世家大族，尤其是谢混、谢灵运等人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说：“宋初文咏，体有因革，庄老告退，而山水方滋。俪采百字之偶，争价一句之奇，情必极貌以写物，辞必穷力而追新，此近世之所竞也。”这固然是诗史内在理路的流转，也是世族文学审美趣味的自我变革。南朝时代，世家大族在政治上不复东晋往昔的簪缨辉煌，但在诗坛上依然独领风骚，人杰辈出。在入选本书的诗人中，谢家的谢瞻、谢灵运、谢惠连、谢朓，王家的王微、王僧达、王融、王籍、王褒，庾肩吾庾信父子，刘孝绰刘令娴兄妹，在他们背后，都有一个强大的家族文化文学传统。颜延之、袁淑、张融、沈约等等，也都是世族出身。北朝诗人中，杨素、卢思道也都有世族的背景。

与世族贵族相比，南朝王室多半不是老资格的贵族，而是由武转文的新贵，但也有诗史的贡献。创立刘宋的刘裕是行伍出身，不通文学，据说连签字画押都搞不定，亏

得有谋士及时点拨，教他只管把字写大，就能显出王者气魄。他那些几乎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子孙，无法理解乃祖乡巴佬似的俭啬，更看不上他的略输文采。到了第三代的宋孝武帝刘骏、刘铄、刘昶（都是宋文帝的儿子），兄弟三人都有文才，都有诗选入本书，一举弥补了前两代文采的不足，替刘宋王室赢回了面子。萧齐皇帝中，虽然没有前朝刘骏与后代的萧衍那么突出的文才之士，但竟陵王萧子良和随郡王萧子隆，却都喜欢接触文学之士，谈诗论艺，相处甚欢。特别是围绕萧子良西邸的“竟陵八友”，以及永明时代由西邸文士开始扇扬的诗歌声律说，引领了南朝诗歌的新风尚，最终使中国诗歌走上了声律化的道路。诗史功劳簿上，绝不能少了这一笔。梁武帝萧衍及其子萧统、萧纲、萧绎，文学史上合称“四萧”，父子四人都有才学，纵观千年国史，也不多见。本书选录了萧衍和萧绎的诗作。陈朝的末代皇帝陈后主，其政治行为的可笑与文艺才华的可敬，适成大比例的反差。总之，南朝王室贵族与世族贵族这两个群体，是最盛产诗人的，南朝诗歌有显著的贵族趣味，是丝毫不足为奇的。

鲍照是南朝寒素诗人的代表。在世族先据政治和文学要津的时代，寒门出身的鲍照倍受压抑，在压抑中喷薄而出，发出了愤懑不平的高亢声音，闯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殊为难得的是，他的妹妹鲍令暉也有罕见的文才，是南朝并不多见的女诗人之一。本书还选入另外一位女诗人——世族彭城刘氏出身的刘令娴。鲍、刘两位门第背景绝然不同，恰好可以作为南朝女诗人的代表。

从题材内容上看，南北朝诗歌在山水、离别、拟古等方面较多。山水诗是南朝对于诗史的特别贡献，在山水描写中融入赋笔的细腻描绘、人生的玄理思考和心理情绪的投射，技术越来越圆熟，体式也越来越稳定。并称“大小谢”的谢灵运和谢朓的山水诗各有千秋，一个多用赋笔，一个多用比兴，一则以理趣胜，一则以意趣长。到南朝后期，山水写景技术更加成熟。王籍《入若耶溪》中的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深得对立统一的艺术辩证法。阴铿、何逊等人在物色描写方面的功力，连李白、杜甫这样的大家也不敢小觑。实际上，后来的山水诗人，任他腾挪变化，大抵都跳不出南朝人划出的金箍圈子。

送行赠别诗也屡见不鲜，往往嵌入山水景色的描写，情景交融，韵味悠长。有这样一幕场景：送行者与被送行者都是诗坛名家，都留下了诗作，而且还都是广为传诵的名篇，这就是本书已予选录的范云《之零陵郡次新亭》与谢朓《新亭渚别范零陵云》。对读这两首诗，就好比透过两台摄影机，观看那幕江边依依惜别的情景。

拟古是汉魏六朝文学的时尚，几乎跟流行病一样风行。此风在南朝方兴未艾。每一个成名的南朝诗人集中，基本都可以找到拟古的作品，只是数量多少不同而已。本书选录的谢灵运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》、江淹《杂体诗三十首》，就是这种风气中的典型产品。拟古是对前辈典型的模仿，是对前贤大家的学习，是从艺术大家仓库中借贷，是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认定方式。《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》和《杂体诗三十首》，都是拟古组诗，规模大，规划